

书评



经天纬地，原始要终：评祝东《早期中国符号学思想与伦理转向》

兰 兴

Measuring Heaven and Earth, Investigating the Origin and End: A Review of Zhu Dong's *Early Chinese Symbolic Thoughts and Ethical Turn*

Lan Xing

书名：《早期中国符号学思想与伦理转向》

作者：祝东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2月

ISBN：9787208180864

DOI：10.13760/b.cnki.sam.202302020

祝东教授新作《早期中国符号学思想与伦理转向》以符号学为基础框架对早期中国的文献典籍加以检视，以发掘早期中国文献典籍中体现的伦理符号思想，回顾古代中国对符号系统的思考与运用历程，并以此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规约和伦理精神。继《先秦符号思想研究》与《中国古代符号思想史论》之后，《早期中国符号学思想与伦理转向》（以下称“祝著”）进一步拓展了我们以符号学方法研究中国伦理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视野，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符号学提供了样本。

从古至今,相比起论易演范这类研精阐微的学问,伦理礼仪虽然看上去因循守正且雅俗共习,却因文献缺失等故成为中国学术史上最不易推进的环节。清代秦蕙田《五礼通考》(2020, p. 1)对此有精当的讨论——“三代时礼行于上,自王侯迄士庶皆肄习焉,无庸稽之简册也。凌夷至春秋,学士大夫犹相与讲明指示,斯须不去。秦燔典籍,礼经荡然,叔孙通补苴于汉,仅以绵蕞习之而礼,几不可问矣。自时厥后,注疏家掇拾煨烬之余,强以己意附会,分离乖隔,瑕衅百端。”正因如此,关于礼仪伦常的讨论从汉代开始便十分不易。唐代孔颖达在编纂《五经正义》时就认为关于礼仪伦理的讨论“治丝益棼”,而清代四库馆臣在论及《礼》类文献时称“自古议礼如聚讼”。由此可见,关于伦理礼乐的讨论自古以来便争讼不断,虽然与“三礼”相关的注疏卷帙浩繁且灼见颇丰,但这些注疏文献几乎仅以《仪礼》等经典字句为讨论基础,且更多关注的是字词考辨以及经义阐释,而对于伦理秩序的生发与发展未有系统化的见证。近些年来,沈善洪《中国伦理思想史》与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等研究虽然有所进取,但是其主要方法依然是以年代为纲对相关文献加以胪列比较,广博有余但创见不足,依然很难直观反映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沿革。

由于中国伦理秩序本身就是建立在阴阳五行、五音八宫十二律等象征符号上,纯粹以年代先后为纲目的文献爬梳并不能很好地揭示伦理思想的生成逻辑与功能机制。也许正是有鉴于此,祝著选择以符号学角度来讨论中国伦理思想。该书共分为六章,分别从易学、天道、五行、礼、乐与名六个角度来讨论早期中国的伦理思想与符号系统的生成与功能机制。相比此前的研究成果,祝著不仅通过缀合符号学中关于认知与伦理的相关理论建构了早期中国伦理文化的研究框架,同时也利用考古实物、传世与出土文献对早期中国伦理文化的形成提出了不少创见,颇为可观。在这里,笔者也将祝著中最值得讨论之处分为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博观约取的理论框架与跨文化视域中的文献印证

符号学在中国已经发展了相当一段时间,但其中部分成果因为符号学思想与其具体讨论联系较为松散而颇受指瑕。就笔者的认知而言,个别研究往往拟出了一个符号学的基础框架,但是具体论证时却未能将传统文献与符号学理论紧密联系,只是用符号学术语概括归纳研究对象。

而祝著开篇便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加以改进——“本身力图避免将符号

学作为理论框架去框套中国的历史文献，或者用中国的文献典籍与思想材料去为西方的符号学理论做注脚”（p. 16）。从结果上看，该书不仅对西方符号学理论做到了博观约取，同时也将理论框架与中国传统文献资源加以缔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首先，祝著紧扣伦理思想，在西方符号学理论的选择上避免了漫无目的的獭祭式引用，而是有的放矢地选取侧重人类认识论方面的符号学理论。在宏观上，该书选择了皮尔斯、苏珊·朗格、约翰·迪利等学者所提出的将符号视为思想表达方式的论说作为以符号学研究中国伦理文化的理论基石。而在微观上，该书主要选择了西比奥克的建模系统理论（Modelling Systems Theory），卡莱维·库尔的生命符号学（Biosemiotics）与生态符号学（Ecosemiotics）与尤克斯库尔的环境意义理论（Umwelt）作为理论路径来展开讨论。上述这些理论几乎都以人类认知逻辑为探讨对象，并不局限于某类或几类文明背景，因此极大限度地杜绝了先入为主的偏见，具有很强的普适性，很适合用于祝著所进行的跨文化研究。

更重要的是，在引述相关符号学理论后，祝著常常在传统文献当中为这些理论找到具体的文献对应，充分论证了这些理论在中国文化当中的适用性。比如尤克斯库尔环境意义理论认为生命体在与生活环境的互动中产生了最初的符号建构行为，而祝著（p. 25）对此理论加以引用后，又在《易经》中为这一学说找到了其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文献对应：“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经》中的这段材料不仅证明了尤克斯库尔的环境意义理论能够很好地与早期中国的文化背景相兼容，同时也在理论上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性。

其次，在引述莫里斯关于社会变革带来符号研究热潮的学说后，祝著（p. 164）又引用《论语》中“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这段孔子在社会变革中对于礼仪名实的讨论来印证莫里斯的说法。这样的文献对应极大程度上认可了相关符号学理论在跨文化背景下的解释力，杜绝了郢书燕说的风险。

由此可见，祝著在西方符号学理论上的博观约取以及将其与中国文献资源加以缔合的努力，使得二者之间联系紧密，为此后的研究提供了可贵参照。

二、“观物－取象－制器尚象”的三阶段模型

中国伦理礼仪的文献可以说卷帙浩繁，不少文献在今天看来更是佶屈聱

牙,其真实性与成书年代也有待考论,因此当代研究者很难从这些陈陈相因的文献中抽丝剥茧以穷举每个具体符号的发展沿革。而祝著则另辟蹊径,认识到中国的伦理符号不仅仅是先民在与自然世界互动后思维加工的产物,同时也用来表征世界与指导生活。在西比奥克所提出的“三度自然”(first, second and third nature)等理论的基础上,祝著将古代中国伦理思想中的《易经》、天道、五行等符号的建立发展及功能发挥归纳为三个阶段:观物,即对自然观测中形成的感知体认与归纳再现;取象,即对符号的赋义、归纳组合与系统建构等;制器尚象,即将建构的符号用于指导实践并建立伦理秩序。

上述“观物-取象-制器尚象”的三阶段模型不仅符合西比奥克等符号学家所得出的人类思想认知顺序,并且与孔颖达等经学家关于中国伦理发展的讨论相互契合。孔颖达在《礼记正义》(1999, pp. 2-3)中对伦理礼仪有如下一段精练概括:

夫礼者,经天纬地,本之则大一之初;原始要终,体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资六气,下乘四序,赋清浊以醇醜,感阴阳而迁变。故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喜怒哀乐之志,于是乎生;动静爱恶之心,于是乎在……故乃上法圆象,下参方载,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夏商革命,损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备。洎乎姬旦,负宸临朝,述《曲礼》以节威仪,制《周礼》而经邦国。

在这段论述中,孔颖达认为伦理礼仪的来源是人在与自然互动中所产生的情绪与喜好,而后人以自然中的“圆象”“方载”等为参照建立了道德伦理,并在此后形成《曲礼》《周礼》等经典以治理朝政。这段论述虽略显吉光片羽,但已说明了伦理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并非天神授予或者圣贤偶得,而是源于普通民众在日常中的感知与归纳。因此,祝著“观物-取象-制器尚象”的三阶段模型与中国伦理思想形成的脉络相契合,能够清晰地反映伦理符号系统发轫变迁的轨迹。

三、四重证据法的运用

2010年,人类学家叶舒宪提出了“四重证据法”,将传世文献(第一重证据)、出土文献(第二重证据)、口头民俗传说(第三重证据)以及文物图像(第四重证据)加以整合并相互印证,从而构成对中国古代文化最为完备的证据版图与论证范式。祝著在具体论证中就对“四重证据法”加以充分运

用，以淹博贯通的文献与详畅纯谨的论证完成了早期中国伦理秩序构建的推演，无论是在文献的搜集还是行文的阐证上都堪称矩范，并取得了令人激赏的结果。笔者在这里举出一例加以说明。

第五章《作乐：乐论的渊源与表意嬗变》将出土实物与传世文献结合，对早期中国音乐及其涵盖的文化秩序加以研讨。关于中国音乐的起源，学界历来众说纷纭，目前有“劳动说”“信号说”“模范自然说”等各种假说，纷纭的原因在于原始材料对此问题的记载也并非定于一说。所以，当下关于中国古乐起源的讨论往往难以有新的建树。而祝著在讨论音乐起源以及文化秩序建构时选择了新的讨论路径，并且将丰富的考古实物、民俗传说以及文字材料加以缀合，提出了更为可信的创见。

首先，选择以考古实物为出发点，通过河南舞阳贾湖、浙江余姚河姆渡以及汉南临汝等遗址中出土的骨哨、骨笛、壁画等实物证明了鸟类与音乐与生俱来的关系。随后又回顾了传世文献与传说中鸟类对于早期中国文化的形塑与影响，比如《禽经》中先民基于观测得出的“鹤仰鸣则晴，俯鸣则阴”的记述，又比如鄂温克族宗教舞蹈中对鹰飞翔与鸣叫的模仿，进而认识到先民将禽鸟作为认识世界的媒介之一。在此基础上，对音乐及其伦理影响得出了新的见解——“人类认识到禽鸟与天地阴阳变化的关系，便以此来建模指导自己的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创制出十二律”（p. 230），而十二律则在此后成了中国伦理秩序中检验天命克谐的工具。在此基础上，祝著（p. 230）注意到了《吕氏春秋》中印证此见解的直观文献：“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

简而言之，先民在日常观测中将鸟类的行为轨迹视为认知世界的途径之一，而考古实物也充分证明了鸟类同音乐与生俱来的关系，祝著因此认识到音乐之所以能在早期中国伦理秩序中占据重要地位，本质上是人类崇拜与模仿禽鸟行为（尤其是其鸣叫声）和自然秩序关系的结果。通过这样的讨论，祝著在纷纭的假说中拨云见日，通过文献与实物找寻到了有关音乐的伦理秩序的生发原因。在做到了理论基础与传统典籍的耦合后，该作对“四重证据法”的使用为我们开辟了一条理解伦理秩序的新路径。

最后，笔者个人认为祝著在某些细节上的表述可以更加完整或精练。首先，祝著的文献搜集已经相当广博详尽，但其中对于汉代经注的使用尚略有提升的空间。就先秦到两汉的伦理礼仪而言，比起孔颖达、朱熹等隔空喊话

□ 符号与传媒 (27)

的后世学者，京房、郑玄、何休等汉代学者自然更有发言权。以易学为例，两汉经学家不仅在《易经》爻辞的基础上创建了若干符号系统，还将其用于伦理文化的归纳阐发。比如京房不仅设立了八宫卦、纳甲、世应、飞伏等符号系统，还将父母、子女、君臣、兄弟等伦理关系归纳到《易经》的卦爻关系当中。而以郑玄为代表的东汉经学家不仅将《易经》的符号象征化发挥到了极致，还将其广泛应用于伦理秩序的演绎中。以“随”卦为例，郑玄在解说此卦时，先按内外卦将其拆分为“震”卦与“兑”卦，并从中得出君主能令众人追随的原因：“震，动也。兑，说也。内动之以德，外说之以言，则天下之人，咸慕其行，而随从之，故谓之随也。”（李鼎祚，1990，p. 85）

其次，祝著在结构细节上也可以有更好的表现。祝著的大部分章节都遵循“观物－取象－制器尚象”的三阶段模型展开，但是相关理论探讨往往集中于每章开头，而绪论部分对这一思路的讨论相对较少。如果开篇能对这一理论框架以及相关理论更醒目地加以提炼整合，不仅能起到提纲挈领的总领作用，而且能使读者更为直观地理解写作逻辑。

综上所述，祝著摒弃了过往研究单纯从文献考辨来讨论伦理沿革的旧有模式，而是以符号学为理论基础开创了研究传统中国伦理思想构建发展的新路径，不仅阐明了早期中国伦理思想及其符号系统的构建，同时也为中国符号学的自觉发展提供了更为明晰的范例。符号学在中国至今已经发展了四十年，将符号学话语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结合以实现中国符号学的自觉独立已经成为许多学者的殷切期待。赵毅衡（2018，p. 146）在回顾符号学四十年来发展历程时就认为传统符号学资源是中国符号学的立身之本，并提出“建立中国学派的任务，必须靠三个方面的努力来实现：一是理解并讲解我们的祖先说了什么，二是了解并明白当代世界学界做了什么，三是找到并坚持我们自己在当代学术中的独特声音”。王铭玉（2018，p. 15）认为中国符号学应该“勇于用中国传统的符号学遗产补充符号学理论体系，在符号学发展前沿上提出新的体系”。黄文虎（2022，p. 63）也认为“将中国传统符号学资源与现代符号学话语有机融合”是中国符号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而祝东教授的这本新作足可称作对上述学者殷切期望的倡答洽应，实属泽惠学林的难得佳作。

引用文献：

黄文虎（2022）. 20世纪80年代以来符号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集美大学学报, 2, 57-

- 孔颖达 (1999). 礼记正义. 北京: 中华书局.
- 李鼎祚 (1990). 周易集解. 成都: 巴蜀书社.
- 秦蕙田 (2020). 五礼通考. 北京: 中华书局.
- 王铭玉 (2018). 中外符号学的发展历程.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6, 1 - 16.
- 赵毅衡 (2018). 符号学作为一种形式文化理论: 四十年发展回顾. 文学评论, 6, 146 - 155.

作者简介:

兰兴,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后, 研究方向为符号学、阐释学、文献学。

Author:

Lan Xing, postdoctoral fellow of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semiotics, hermeneutics and philology.

Email: lxgoalsky@gmail.com